



区域经济与城市经济前沿系列

---

# 长三角城市群

---

网络化组织的多重动因与治理模式

胡 彬 编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区域经济与城市经济前沿系列

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项目编号 B802)

上海财经大学“十一五”“211 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上海发展战略研究所 赵晓雷工作室系列课题

# 长三角城市群

——网络化组织的多重动因与治理模式

胡 彬 编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三角城市群:网络化组织的多重动因与治理模式/胡彬编著.  
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12

(区域经济与城市经济前沿系列)

ISBN 978-7-5642-1221-6/F·1221

I. ①长… II. ①胡… III. ①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研究

IV. ①F299.2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23629 号

责任编辑 宋澄宇

封面设计 钱宇辰

责任校对 王从远

CHANGSANJIAO CHENGSHI JIQUAN

### 长三角城市群

——网络化组织的多重动因与治理模式

胡彬 编著

---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武东路 321 号乙 邮编 200434)

网 址:<http://www.sufep.com>

电子邮箱:webmaster@sufep.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竟成印务有限公司印刷装订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

890mm×1240mm 1/32 6.5 印张 180 千字

定价:25.00 元

## 前 言

长三角区域兴起和繁荣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其发展速度、创造的庞大经济总量、激发地区增长活力的政府能力以及对经济要素的持续吸引力等,似乎都在印证戈特曼早期关于第六大城市群崛起的预言。作为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长三角区域的快速发展既得益于以功能为导向的上海城市转型,也是成功捕捉全球第四次产业转移的分工机会和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结果。当然,其内部富有活力的各种地区发展模式,以及彼此共享的交流历史、区域文化和社会资本等条件和政府间协商与治理机制的不断演化,都为区域内部的要素流动和制度合作提供了可能。可见,也正是受到国内外诸多重要因素的叠加影响效应,才使得长三角区域城市网络化发展这一归属经济区域化过程的研究命题得以成立。

“城市网络”一词是全球城市理论从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频繁讨论的内容。之所以对它格外关注,主要是因为世界/全球城市(world/global city)的成长机制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其中的主因被学术界一致力推为跨国公司占据全球经济的主导地位和信息革命。它们所带来的影响是深刻而复杂的。前者受到市场一体化的激励,通过有目的的投资与贸易活动,实现着全球生产的分散化与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并使得要素流动作为遵循价值管理准则的市场过程,呈现出分层次和地域化的典型特征。为了对要素流动施以高效的管理以及服务于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世界城市经历了一个网络化的升级转型过程。这种转型的发生,必然伴随着国家之间力量对比和竞争格局的变化,一个典型的现象就是新兴经济体的城市和区域因其

对外部资本的巨大吸引力,以及政府为融入全球化而做出的各种努力,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体系,为新兴经济体赢得了发展的机遇,也引发了城市之间关系的新一轮演变。作为产业内和企业内贸易发展的结果,全球价值链分工表现为资本对新兴市场成本优势的一种大范围追逐。同时,地方层面日益宽松的制度结构、服务市场的发展和城市化的推进等也都从需求角度加速了全球价值链的垂直分解,造就了共享外部经济和受益于集体效率的产业集群、新产业区等地方性经济组织。这进而促使集中与分散作为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充斥在城市的合作与竞争之中,导致城市体系内部的分层现象不断加剧,城市差异化发展的愿望也逐步增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尽管在意愿与行动上都具有参与新型国际分工的强烈动机与积极性,但是,鉴于价值链治理不对称关系的客观存在,利益分配不均衡的格局往往使得发展中国家介入全球分工体系的结果陷于“被动”,表现为地方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性与产业升级的困难。其中的主要原因,有地方性的生产组织游离在城市公共管理与服务的体系之外、城市的制度发展相对于生产组织而言显得过于滞后以及城乡二元差距悬殊等。因此,我们认为,产业升级不可能单纯依靠企业或地方政府的努力,还要依靠基于与全球经济的开放互动和城市网络层级丰富的区域合作,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治理模式改变与创新,以一种组织化的方式有序实现。

在微观方面,城市是否能够发展成为网络组织的节点,是由价值链的活跃程度以及地方性产业组织的升级动能决定的。单个价值链作为完整产业链的一部分,在竞争与升级过程中离不开区域协调的努力。事实上,根植于地方经济价值链活动采取怎样的发展方式,往往又与地方政府的治理体制和激励重点相关,例如,浙江的温州模式和江苏的苏南模式及之后的新苏南模式。带有治理惯性的地方发展模式,在全球化的竞争环境中,也会通过弊端矫正和制度学习等方式不断演化并出现类似趋同的特点,以适应全球化对标准与管理模

式统一的规范要求。与此同时,通过发展专注于某个价值链的经济活动,城市也应尽快形成专业化的经济职能,并以此为集群升级和地区可持续发展预留空间。

对全球化产生重大影响的另外一个因素就是信息技术革命。对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学术界形成了两派迥然不同的观点:一派观点认为,信息技术必然会带来“地理的终结”、“距离的消亡”等空间衰落现象;另一派观点认为,电子化的信息网络将复兴社区和地方空间,它们在集聚要素和创造财富中的作用将日益凸显。然而,在现实中,却形成了两股相反却又彼此互动的力量——全球化和地方化。全球化发展在加深地方经济主体之间合作的同时,也让其自身的影响获得了某种延续。空间尺度上的这些变化,极大地拓宽了要素流动的传统范围并形成了新的要素聚合方式,同时也使得缔结和维护区域利益关系的治理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一些具有自我组织机能的、以关系治理见长的网络生产组织纷纷兴起,以突出的竞争优势开始在全球和区域经济中担当重要角色;另一方面,在这场发生在地方空间的生存演化过程中,力推全球化的跨国公司也受益匪浅,包括在区位上赢得了更广泛的选择权,最大限度地为聚焦自身的核心能力开辟了外部资源的获取渠道以及利用地方能力实现价值链的分散化管理等,所有这些都驱使它们寻求能够驾驭价值链的权力资源,甚至取径“分散式的集中”探索可能维持其主导地位的新的组织治理模式。它所表现出的一个典型现象就是,在信息化构造的无边界的新全球经济中,全球城市凭借对信息的创造、交换和使用能力,将分散的生产区位纳入由其服务业覆盖的网络体系。它们作为高层次的价值治理手段,超越了城市和区域的边界范畴,重点对流量经济的运行秩序与效率实施管理。

信息技术进步的影响远不止于此。西方学者认为,它的出现催生了一个新的社会——技术范式。其显著特征之一是,信息以其对知识生产和服务的巨大促进为主要特征,并因此一跃成为新的高级要素。为了确保知识的跨界流动,城市有待于增强生产、加工、传递

与转化信息的相关功能和提高通信基础设施与信息生产的部门竞争力,这也给以卷入方式参与国际分工的发展中国家提出了新的发展方向,包括产业结构的软化、核心商务功能的提升、人力资本与创意思想的供给等。在地方化系统孕育竞争优势的开放格局中,城市的角色与作用有待于重新认识,包括打通与全球城市网络对接的“梗阻”环节,以及在服务、知识、创新环境、文化投入、社会资本投资等方面为这些地方化的生产系统提供支撑。因此,即便是在地方层面上,城市网络化发展也依然具有相当丰富的内容,它应该成为我国城市区域发展的主要方向。首先,这需要区域中的核心城市保持与全球经济的密切联系,通过发展向全球城市看齐的门户功能,为地方化的生产组织提供信息便捷的外部联系;其次,区域内部的各个城市之间要顺应市场的发展规律,消弥制度性壁垒,减小要素流动的盲目性,以及在“场所特质”的城市竞争要素方面,诸如区位、基础设施、自然资源条件、城市环境宜人程度、城市区域形象、人力资源和企业文化、管治和政策体系等方面,增加投入和加大改革力度。从这个角度来看,长三角区域的城市网络化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如何架构一个多层次、常态化的治理体制,它对于依赖合作的新的城市竞争形式来说是非常关键的。

区域的开放发展必然会带来空间结构的重组,一些新的合作机会将涌现出来并改变原先的城市关系结构。以长江流域为例,它的上、中、下游分布着资源禀赋各异、发展阶段不同、经济结构多样化的经济系统,它们既是长三角区域发展的外部空间,也是更大尺度城市网络形成的基础,与长三角区域发展战略和治理举措的实施成效休戚相关。如何避免可能出现的板块分异现象和拓展城市外部网络关系,需要重点发展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城市区域和探索重大问题区域共治的管理思路。

当前,在长三角区域,核心城市的高层次服务功能明显不足、城市过渡期的转型压力大、政府主导市场化改革的内在阻力、区域市场合作深度不够、城市竞争关系未理顺以及区域治理手段过于单一等

问题,都对城市网络化发展构成了制约,亟需从多方面改善和努力。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办,给予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区域融入国际舞台的难得机会,对上海的城市转型、长三角的区域合作以及长江流域的战略协作等都意义重大,同时也意味着上海依靠发展全球城市带动长三角区域合作的网络化路径正在步入一个新的阶段。



# 目 录

前言/1

## 第一章 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区域竞争范式/1

一、引言/1

二、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背景与驱动因素/2

三、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的区域竞争优势来源与决定因素/5

四、增强区域竞争优势的政策建议与措施/11

## 第二章 全球空间网络化重构的地方化效应：空间要素的视角/16

一、引言/16

二、传统区位因子向现代空间要素转变的理论分析/17

三、空间要素的组织性特征与组织共性/22

四、全球空间结构重构的地方化效应：对长三角区域的影响/28

五、本章小结/32

## 第三章 城市区域视角的长三角城市网络化发展状况/36

一、城市网络理论的发展演变与城市网络化的决定因素/36

二、长三角城市群发展的经济与功能联系/41

三、长三角城市群网络化发展状况的判断/50

四、长三角构建城市网络的发展方向/55

五、本章小结/60

#### 第四章 长三角城市网络发展的城乡统筹机制:以苏南地区为例/62

- 一、问题的提出/62
- 二、如何看待和认识城乡统筹的地域关系与空间组织结构/64
- 三、城乡二元关系演变的地域结构特征与成因分析:以苏南地区为例/67
- 四、苏南地区构建一体化城乡地域系统助推城乡统筹的设想与对策/74

#### 第五章 社会资本的网络“战略再嵌入”功能:对“浙江模式”的研究/81

- 一、引言/81
- 二、组织演化中的社会资本互补投资/82
- 三、社会资本互补投资旨在建构“多律协调”的制度体系/87
- 四、“浙江模式”转型中的社会资本投资/91
- 五、结论与展望/99

#### 第六章 苏温地区发展“模式趋同”的原因与区域合作机制/103

- 一、“模式趋同”:苏温地区经济转型中的新现象/103
- 二、苏温两地发展“模式趋同”的背景与原因/105
- 三、苏温地区发展模式转变中的制度学习动机/110
- 四、地区发展“模式趋同”视角下的区域合作机制与内容/121

#### 第七章 区域空间结构重组的网络化机制:基于长江流域的考察/129

- 一、区域经济板块结构理论及制度视角的拓展性分析/129
- 二、长江流域区域板块结构分异的制度成因/136
- 三、长江流域板块融合的区域空间结构重组与制度保障/142
- 四、相关政策/148

## 第八章 世博会对长三角区域城市网络化发展的影响/152

一、引言/152

二、世博会因素导入长三角区域发展的关系起点与联动影响/153

三、世博会对长三角区域联动发展的直接促进作用/158

四、激励后世博效应持续释放的政策重点/161

## 第九章 长三角城市网络发展的规划层次与协调治理机制/167

一、城市经济网络内涵的广义与狭义之分/167

二、城市经济网络规划的理论依据与内容层次/169

三、城市经济网络规划的协调治理机制/172

四、长三角区域合作的模式与问题/174

五、基于全球城市区域建设的长三角城市网络化治理对策/185



# 第一章

## 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区域竞争范式

### 一、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将那些参与其中的发展中国家纳入到全球经济的大循环体系之中,在跨国公司谋求产业非核心价值链环节转移的同时,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也加快了通过地方经济的组织化创新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升级步伐,典型的如西班牙的 Sinos Valley 制鞋业集群、印度南部的 Tirupur 服装产业集群、意大利的陶瓷业集群和我国沿海三角洲区域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等。在价值链分布的每一个区位节点上,本地不可流动或流动性较差的资源,如土地、低技能的劳动力与全球流动性资源,如资本、管理和技术等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紧密结合。全球价值链的存在,为产业集群摆脱地方发展的路径锁定、增强与群外环境的交流和优化地区产业结构创造了机遇。无论是传统制造业还是高科技制造业部门,都可能从中获得地方产业集群升级的机会,区域经济的发展也相应被注入了全新的活力。这一现象启示我们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全面地审视当前区域竞争力的背景动因、来源途径与获得渠道等问题。

## 二、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背景与驱动因素

### (一)全球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分工

如果说 20 世纪 80 年代是全球价值链兴起并对区域经济实施影响的时代,那么,90 年代学者们则集中于关注新的全球化趋势下如何通过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来提升区域竞争力的问题。较完整的全球价值链理论是由 Gereffi 和 Korzeniewicz(1994)提出的。被他们称之为全球商品链(global commodity chain)的概念是指围绕着某种商品的生产形成的包括各地区不同规模企业、机构甚至是家庭生产组织的跨国生产一体化网络组织体系。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在《2002~2003 年度工业发展报告——通过创新和学习来参与竞争》中指出,全球价值链是指在全球范围内为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涉及从原料采集和运输,半成品和成品生产及分销,直至最终消费和回收处理的整个过程。这些对全球价值链的界定几乎涵盖了它们参与分工的主要特性:可分解性、可整合性和地域配置的有效性,且三者缺一不可。可见,全球价值链是具有空间意义的、依存于特定产业组织与企业竞争力的、能充分有效利用国内外两种优势资源的、依存于某种治理模式的价值增值系统。

与基于比较优势的产业外分工不同,价值链分工作为产业内分工的有效形式,其优势来自于需求多样化驱动的产品技术持续创新和垄断竞争的递增收益。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意义还不止于此。按照传统的分工理论,那些禀赋优势不显著的地区极有可能被排斥在区域分工的有效范畴之外,依靠区域分工带动地区经济增长的目标也将难以实现。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价值链的垂直分解,区域分工与贸易经常在禀赋结构相似的地区之间开展,甚至不具备禀赋优势的地区也能够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持续创新从中分得一杯羹,因此区域经济也可能成为全球生产网络中的重要一环。这些都需要我们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客观并全面地审视区域竞争优势的来

源与促进的问题。

## (二)背景与驱动因素

全球价值链分工作为覆盖全球范围的产业组织变革,是在特定背景下受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信息技术进步和生产服务业功能转型等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

1. 由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主导的世界产品价值体系创造模式的变化,加速了价值链在全球范围内的垂直分解,为实现全球范围价值整合的全球生产网络等治理模式也应运而生,并日益凸显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在全球贸易自由主义的推动下,资本的流动性明显增强,其突破本地资源限制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PC行业,以及其后被波及的电子、汽车、家电、通讯设备、医药和服装等制造业领域,都在跨国公司追求核心竞争力战略的主导下,加速了价值链在全球范围内的垂直分离与重构,并引起全球范围内中间产品贸易量的大幅度增长。据资料显示,世界贸易中的零部件贸易从1992年的4000亿美元增长到2003年的10000亿美元,这些产品贸易占到全世界制造业产品贸易额的比重也相应从17%上升到23%(Athukorala和Yamashita,2005)。与这种全新贸易模式相对应的是由分包、转包和全球采购等驱动的全球生产关系的网络化和价值链分布的各个空间节点上层出不穷的地方化产业集群现象。供应商网络的协作关系、战略联盟和集群经济的组织联系等都成为全球化条件下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机制,并催生了新一轮以区域为基础的全球竞争。

2. 信息产业技术确立的“以网络为中心”的产业组织模式及其组织区位优势,提高了价值链空间配置的地理弹性,为中小企业和落后地区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提供了机遇。20世纪90年代中期,信息产业出现的一些新发展特征,包括顾客的用户导向、增值服务占主导地位、本地区供应商的大量兴起和以通讯价值链为基础的组织结构等(戴维·莫谢拉,1997),都加大了地区经济参与全球化的广度与深度。只不过,此时的地区竞争优势不再仅局限于特定空间内产业

组织创新的交易与协作成本节约和由集体学习与技术外溢带来的创新优势。信息区位的网络覆盖面、网络节点的信息交流密度、网络组织结构的知识传播与共享功能等为区域经济提供了更加开放的外部环境,使集群经济得以通过与其他集群组织甚至是区域外的行为主体之间展开包括生产、信息、技术与文化等在内的多方面交流,从而获得基于价值链等级攀升的升级机会。

3. 生产服务业在经济体系中的功能转变,有力地支持了价值链在全球范围内从分解到整合的增值需求。Browning 和 Singelman (1975)、Martinelli(1991)等人将知识性、组织性、中间性和创新性概括为生产服务业的共同特征(李江帆、毕斗斗,2004)。<sup>①</sup> 新兴的服务业在全新的技术与贸易结构体系下扮演的通常是知识中介(brokers of knowledge)的角色。为市场提供知识密集服务的中小型服务企业作为地方集群经济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促进了高新技术和传统产业集群的发展。它们不仅构成了产业集群的重要制度与组织支持,而且还在价值链的组织体系中引入竞争机制,保障了价值链垂直分离的成本有效性,并在价值链的诸环节间建立起基于知识流动的紧密关系。

20 世纪 90 年代,生产服务业从生产力促进功能向战略性“推进器作用”的功能转变,迎合了不同空间、层次价值链协调与整合的增值需求。在外包体系下发展起来的第三方生产服务业成为价值链增值的主要来源之一,为发展中国家升级式地融入全球价值链系统提供了机会。印度的班加罗尔就是为包括 IBM、Motorola、Digital 和 HP 等在内的大公司提供软件外包服务而发展起来的典型例子。所

---

<sup>①</sup> Browning 和 Singelman(1975) 提出,生产服务业包括金融、保险、法律、商务和经纪等知识密集型专业服务。Martinelli (1991) 认为,生产服务业包括与资源分配和流通相关的活动(如银行业、金融业、工程、猎头、培训等),产品和流程设计及与创新相关的活动(如研发、设计、工程等),与生产组织和管理本身相关的活动(如信息咨询、信息处理、财务、法律服务等),与生产本身相关的活动(如质量控制、维持和后勤等),以及与产品推广和配销相关的活动(如运输、市场营销、广告等)。

以,全球价值链中的产业集群升级离不开服务产业资本动员、集聚及深度利用全球优势资源的战略性功能。目前,服务业已经成为我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新重点。自 2003 年以来,外商在我国服务业中的投资出现了许多突破性进展,房地产、金融保险、交通运输、电信、批发零售贸易等是外资流入的主要行业。在某些发达沿海省市,现代服务业的引资总额的比重甚至超过了 50%(如 2005 年的上海),并推动了这些地区服务业的较快增长。这一方面弥补了我国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作为全球价值链治理者的权力主体,期望更大程度地分配和占有地方产业集群升级带来的增值收益。这意味着,在具有优势资源的地区中,集群经济一旦切入全球价值链的某个分工环节,就具备了来自于外部的升级动力,但是要占有更大升级增值份额,还必须切实提高本土服务业的发展质量和服务能力。这些动力机制,除了客观上起到促进地方产业集群升级的效果以外,更重要的则在于满足全球价值链治理的需要,在质量标准、价值链各环节之间的协调性等方面提供保障。

### 三、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的区域竞争优势来源与决定因素

#### (一)全球价值链分工环境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环境中,区域经济至少受到三方面的影响。首先,主导区域经济发展的力量日益微观化与外在化,地方产业集群升级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依赖于多元行动主体在开放环境下共同实施经济活动的集体效率(collective efficiency)。这也是为什么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集群经济能够在自我组织的基础上显示出强大竞争优势的内在原因,典型的如印度 Ludhiana 毛织品集群和我国台湾的个人电脑产业集群,它们都通过升级强化了区域经济的竞争力。其次,开放条件下区域经济发展的风险来源与以往有显著的不同。加入 WTO,意味着我国的经济发展将进入持续开放且不可逆转的新历史时期,一旦地方与区域的经济的发展未被纳入全球价值体系重构的范畴,将最终沦为最不利的全球分工地位并面临巨大的“体系脱



离”风险。最后,随着全球价值链空间治理模式的演进,地方空间与全球空间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相互融合,并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这种覆盖全球范围内的产业组织变革只有得到空间经济条件同步变化的响应时,才能真正转化为区域经济发展的竞争优势。

## (二) 区域基于空间价值再发现的竞争优势来源

全球价值链分为生产者驱动和购买者驱动这两大类型。在生产者方面,投资者凭借其技术优势或出于建立自主工业体系的战略考虑,进入汽车、电脑、飞机和重型机械等规模经济与创新领先优势显著的产业领域(张辉,2004)。区域的研发与创新能力、产业结构的升级情况、基础设施与生产环境的好坏,都是生产者驱动型全球价值链区位选择的主要衡量标准。在购买者方面,居于活跃地位的通常是大型的零售商、品牌销售商和贸易公司等商业资本,它们以范围经济为基础,以利用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成本优势为目的,主要分布在成衣制造、鞋类、玩具、家用电器、电子消费品和各种手工业品等领域。商业资本提供的市场平台和流通渠道,降低了中小企业的市场进入门槛,使中小城市甚至是非城市地区也具备了接触全球资本的机会。目前,有不少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就是由此类价值链来驱动的。这意味着,不论是哪一种形式的全球价值链,不论什么范围的具体空间,都使地方产业集群在攀升价值链等级的过程中有机会获得基于空间价值再发现的竞争优势。

1. 本地生产企业通过直面激烈的国际竞争和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利益分配,将逐渐发现区域产业集群的整体升级潜能。Kaplinsky 和 Morris(2001)曾将价值链治理条件下的地方产业集群升级归纳为过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链的升级这四种类型,分别概括了过程技术创新引起的生产成本降低和生产效率提高、产品技术研发的新产品种类增加、价值链由低向高的跃升和跨价值链的产业转换等升级过程。尽管价值链治理旨在从保障不同形式升级的顺利实现中获取收益,但任何形式的升级对特定的地区而言并不